

今本《诗经》已非原来面目

李家树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

现在先秦古籍，真贋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①

所谓“字字可信可宝者”，只是说《诗经》没有后人伪作的孱入，不象同时期的又经秦始皇焚烧的《尚书》那样真伪混杂而已。其实，传世的《诗经》本子（以《毛诗》为主，鲁、齐、韩三家仅得佚文），已经不是它的本来面目。

一九三五年，朱东润在他那篇名重一时的文章《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里，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疑问说：

文化之絀絀，苟以某一时代之偶然现象论之，纵不免有后不如前之叹，然果自大体立论，则以人类智识之牖启，日甚一日，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殆无疑议，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以自拔？^②

朱氏这篇文章，主要从《国风》一百六十篇本文出发，考证它的作者跟《雅》、《颂》一样，同出于贵族阶级，因为《国风》在文学上所显示的惊人成就，似乎不是一般民间歌谣可以达到的。他的结论，容或有误，却相反相成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国风》是民间歌谣，而现在的面目不类民间歌谣，必然是曾经后人在艺术上加工过的。到了一九五一年，郭沫若就把这个事实具体指出来，他在《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中说：

……其实《诗经》是很可以“怀疑”的。虽然不能说是“后人伪造”，但必然是经过后人修改润色，整齐划一过的东西。例如从时代来讲，从周初至春秋末年，有五六百年之久；从地域来讲，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包含着二十来个国家；从作者来讲，《国风》取自各国民间，《雅》、《颂》取自朝廷贵族；但诗的体裁大体上是一致的，用韵也是一致的，而在《国风》中竟找不到多少民间方言。请把《楚辞》和《诗经》一比，更可以使我们增加疑问。《楚辞》（汉人作品除外）是楚国一国少数人的作品，用韵虽然一致，而体裁便有不少的变化：《离骚》与《招魂》不同，《九章》与《九歌》有别。地方色彩的浓厚，民间方言的众多，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把这两者一对比，便可以看出……《诗经》毫无疑问是经过删改的。古人说“孔子删《诗》”，我看不单是孔子一人，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③

翻开今本《诗经》，可以发现许多统一修改了的现象：（一）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产生于不同的地域，但其中没有方言的分歧；（二）《诗经》的制作年代，上下五六百年，但押韵的范围始终一致；（三）《诗经》的篇数超过三百，而形式极为整齐，以四言为主。从这三个现象看来，今本《诗经》恐怕已经失掉它的原来面目，因为诗篇曾经采诗者的润色，使之雅言化，然后乐师再作字句上的删改，使之合乐（可能韵脚是主要原因）；经过几番手续，势必要改变本来的面貌了。

跟《楚辞》比较，《诗经》所显现的地方色彩并不浓厚，主要是没有方言的歧异。譬如二《南》里虽有楚风，不见楚语，正是由于经过周人修改的缘故，而周人依据的标准，是当时流行于北方的“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晋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雅言，正言也。”又引郑玄说：“读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所谓“雅言”，指比较正规的语言，这是汉人的解

释。事实上，“雅言”就是“夏言”。《荀子·荣辱》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又同书的《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这里的“君子安雅”和“居夏而夏”相对，雅和夏同义；夏即中夏，后来的“诸夏”是指黄河南北各国。所以，清刘台拱《论语骈枝》说雅言就是“王都之言”，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周室西都，当以西都音为正”，即是当时的官话了^①。这是先秦时代一种通行于上层阶级的共同语，跟各地方言的语音甚至语词都有显著的分别，进而影响到书面语言；象《诗》、《书》、《易》和《春秋》等书面语，它们跟下层阶级的口语，就形成了一定的距离。《诗经》大半是民间歌谣，但是采诗之官运用文字工具记录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经历了“雅化”的程序。西汉刘向《说苑》就有一个民间作品雅化的例子，可以拿来作为印证。《善说篇》记载榜柁越人当鄂君面前唱了一首歌说：

滥兮抃草，滥予昌柎，泽予昌州，州谿州焉乎，秦胥胥
纆予乎，昭漘秦踰，渗悞随河湖。

夹杂着不少越国的方言俚语，鄂君听不懂，于是找人译成楚语说：

今夕何夕兮，搴中州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
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证明经过一番文字的雅译工夫，可以消除方言的歧异，然后才明白好懂，而《诗经》也大抵在雅化的情况下改变了本来面貌。

为了使歌词合乐，乐师必定加以润色，否则就不便弦歌。各地方言不同，歌谣的韵脚应该是随地而异的，但今本《诗经》中诸诗韵部的分合，大体上一致。缪钺据黄侃所分的古音二十八部为准，就《诗经》三百零五篇的用韵，仔细考核，发觉“异部合韵”的仅得九十条。他在《周代之雅言》一文中统计说：

统计以上所辑录，异部合韵者共九十条，合为四十七类。《诗》三百五篇，除《周颂》三十一篇，尚余二百七十四篇。每篇多者十余章，少者二三章。每章之中，有一韵者，亦有换韵两次或三次者。统计此二百七十四篇用韵之处，共一千六百五十四。《诗》三百篇，以时论，上下五百年；以地言，纵横十余国。且当时作诗，皆本唇吻自然之音，非若后世之韵书，而在一千六百五十四处用韵之中，异部合韵仅九十条，其余均在同部。……可见当时必有一种标准语，即所谓“雅言”，为诗人所据，故虽绝国殊乡，用韵乃不谋而合。⑤

由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上下五六百年，而其间诗篇在押韵范围上不但始终一致，即使是例外押韵的情况也几乎一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最不稳定的是语音，所以当时必定有一个人为的语音系统，而这语音系统又是从“雅言”演变而成的。为了遵守这个语音系统，对采集所得的各国民歌，也要进行窜改，在删掉方言语音的时候，结果连诗篇原有的字句也都受影响了⑥。

如果《诗经》所录全为乐歌⑦，为了合乐，更需要大量的改动，不但要照顾押韵，还要照顾诗歌形式和章节的问题。今本《诗经》的字句形式整齐，多以四言为主，而且有几个套子，反复运用，如出一手，例如“山有……隰有”、“未见……既见”、“岂不尔思”等等，很难想象距离极远的东西南北的歌谣作者彼此模仿⑧。此外，《诗经》诸诗的章节，大多复沓重叠，不类民间歌谣。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说：

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是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它数章是乐师中述的乐章⑨。

屈万里曾粗略估计过，在《国风》一百六十篇诗之中，回环复沓的诗篇共约一百三十三首，不回环复沓的共约二十七首^⑩。从两者数量的多寡看来，可见《诗经》中的诗，特别是《国风》部分，再不是民间歌谣的原来面目了。还是入乐前形式的诗，在先秦典籍里，很难找到例子。《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令尹子革引祭公谋父谏周穆王之诗，名叫《祈招》，形式参差不齐，跟常见的《诗经》的整齐形式有些不同：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从体裁而言，《祈招》之诗应属“雅”类，但形式极不整齐，似乎还保持着入乐以前的形式。如果把它加工一下，就很容易变成四言诗了：

祈招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形民之力，无醉饱心。

《诗经》里的人民口头创作，要改为整齐的四言形式，恐怕也是使用这个办法，删掉一些助词、连词，即可成为今本《诗经》的形式。

古诗在当时被集中整编过，是不容置疑的^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首创孔子删《诗》之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班固《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也同意孔子删《诗》：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似乎负责集中整编《诗经》的人是孔子。但孔子删《诗》之说，疑点极多。清李惇《群经识小》说得好：

《史记》谓古诗三千，孔子删为三百，误矣，即删《诗》之说亦非；孔子考订诗篇，使之得所则有之，删则未也。观经传所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辞多雅正，亦不

在可删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于夫子之前，非夫子删之也。卫郑齐陈，皆有“淫诗”，夫子不删，所删者何等诗耶？……《论语》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诗不止于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数，夫子岂取既删之后以为言，而曰人诵我所删三百乎？必不然矣。^②

孔子时，诗的搜集已有成数。《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孔子自己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证明孔子之时，《诗》的流传，只得三百五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乐师歌《诗》的程序，跟今本《诗经》的编次大略相同，而孔子时年八岁，可见在孔子以前，《诗经》早有定本了。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左传》和《国语》所记载的引诗歌诗，便有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诗篇见于《诗经》，逸诗只占百分之五^③。这说明了当时流传的《诗经》本子，还是比较固定的。有一点不妨指出，《史记·宋世家》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以为《商颂》是宋诗，词意是很明显的。但是，《孔子世家》说：“上采契、后稷”，又把《商颂》当作商代的诗，前后互相矛盾。总而言之，现在所见的《孔子世家》的一段记载极有问题，对所谓删《诗》之说是不能不加以怀疑的^④。《论语·子罕》引录了孔子一句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按孔子述而不作，对《诗经》的贡献，恐怕不是在删诗方面，而是在正乐方面。

那么，《诗经》究竟是谁集中整编过的呢？答案是当时采诗之官和乐师。《礼记·王制》说：

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

民风。

《汉书·食货志》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说：

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

采诗之制的内容，向来都说得不大清楚。因为民间歌谣最能反映人民的情状，统治者为了审查政治的脉搏，特别设置采诗之官，到民间去采集诗歌，也是可能的事。各国都可能进行采诗，但没有一定制度，无论在组织或者规模方面，都是没法跟后来的汉代乐府^①相比的。除了采诗以外，同时还有献诗之说，《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国语·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勃。

又《晋语》六记范文子劝戒赵文子说：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胥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

似乎所献的诗，都是讽谏的诗，所以要“师箴，瞽赋，矇诵”，

请瞎子乐工做传达的人，以免获罪。无论采诗或者献诗，诗歌必须雅化，呈给统治者以后，就要入乐。日人白川静（SHIRAKAWA Shizuka）《诗经研究》说：

传统说法，中国古有采诗之官，搜集民谣以观察各地风俗之良否，作为施政的参考，这是诗古典化以后的解释。民谣采入贵族的宴游歌咏，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国风》和《小雅》的交流乃始于此。《小雅》的《采薇》和《出车》是贵族社会征役之诗，可能当军歌唱的。第四章取《召南》的“何彼襁矣”，《出车》第五章亦取《召南》的《草虫》，……这意味着《小雅》诗篇制作之际，《国风》诗已见知于社会。随着乐器之发达，乐律之复杂，诗篇形式亦复杂化。时或采取既存的歌谣，改编原歌以制作新篇。《诗经》卷首第一篇《关雎》是乐歌，供贵族飨宴时吟唱，但宴会酬唱不是《关雎》的本色。⑯

在诗歌和音乐交响之下，政治的客观方面的反应自然地深深体会得到。《论语·微子》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辽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由此足见古代之乐师很多，什么地方有新的歌谣，他们就去搜集，并且把所采得的被之以管弦了。

属于民间的歌谣，一旦给统治者攘为己有，为了个人和政治的利益，经过最初的采录、合乐、删订或传写，已经损害了它的本来面貌。翻开辑录三家最完备的陈乔枏《三家诗遗说考》和《四家诗异文考》⑰，《毛诗》跟“鲁”、“齐”、“韩”三家的异文多得令人莫衷一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据同年出土的一件纪年木牍，可以断定墓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⑱。帛书的字体，《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推算抄写的年代，最晚在高祖时期，即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前一九五年间⑲。甲本卷后古佚书共四篇，第一篇是儒家的作品，文体跟

《大学》相近，词上也套用《句孟子》的话，可知作者是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⑩。文内引用了若干《诗经》的句子，字句跟传世的《毛诗》大有出入；帛书引《诗》虽不多，但借字的用法，绝不见于传世的经典^⑪。从这些异文，可以推想今本《诗经》，不但不能视为先秦的原来面目，就是跟秦汉之际儒家所用本子也有一定的距离。

注：

- ①见《国学研读法三种》，页六九，台中华，一九五八年。
- ②见《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一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 ③见《奴隶制时代》，页一〇三—四，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 ④参考：缪钺《周代之雅言》，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页二五—四八，一九四一年；王力《汉语史稿》第七节，上册，页三六—八，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一九五六年第一期，页一二七—三五；孙作云《说“雅”》，见《诗经研究论文集》，页二六〇—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 ⑤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页三八，一九四一年。
- ⑥参考夏平（黄六平）《今本诗经不能全面信赖的问题》，见《急就二集》，页一七一—九，香港中华，一九七八年。
- ⑦参考：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之意见》，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页五八九—九二，香港太平书局根据朴社一九三五年版重印，一九六三年；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页六〇八—五七；张西堂《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见《诗经六论》，页一—十八，上海商务一九五七年。
- ⑧参考余冠英《关于改“诗”问题——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一封信》，见《文学评论》，一九六三年第一期，页一八—二七。又魏建功认为重奏复沓是古代歌谣的表现的最要紧的方法之一，绝不是人

工所能强为的，所以否认《诗经》曾经入乐（《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页五九二——六〇八）美William McNaughton认为诗人为了突出主题，于是在诗篇中运用回环往复的方法，来创造一个“合成的意象”（composite image），所以《诗经》中的作品就不乏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而章数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的例子（“The Composite Image, Shy Jing poetics”,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March, 1963, pp.92—106）。C.H.Wang（王靖献）引用由Parry Lord提出并流行于西方的口传文学（oral literature）中套语（formulaic expression）运用的理论，指出《国风》中的诗是即兴做成（improvisation），所以诗中有很多现成的套语（ready-made formulae），参考“The Bell and the Dru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魏氏等人之说，对歌谣本质的看法，跟顾颉刚、余冠英的不同，录之以备一说。

⑨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页五九一。

⑩见《论国风非民间歌谣的本来面目》，《史语所集刊》三十四下，页四七七——九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⑪翻开今本《毛诗》，诗是集中整编过的，不然不会那么整齐划一。二《雅》及《周颂》固然都是十篇一组，十五《国风》也以十篇及十篇上下者为多。其内容主题也有不少表现得较为集中的，如《周颂》及《大雅》的第一组各十篇，都是歌颂开国诸王之功德，《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都是统治阶级征伐田猎宴乐歌颂之词，《节南山》之什都是政治败坏之事，《魏风》全是反抗剥削和统治阶级等等。

⑫见《皇清经解》卷七百二十一，第十二册，页八四二四，台湾复兴书局印行。

⑬参考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古诗非三千之非》条，页二五——七，上海商务，一九五七年。

⑭参考张西堂《诗经的编订》，见《诗经六论》，页七八——九七；缪钺《诗三百篇纂辑考》，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三集，页七五七——七三，一九四三年；陈槃《诗三百篇之采集与删定问题》，见《学术季刊》卷三：二，页十四——二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⑮《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

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九章之歌。”（第四册，页一〇四五，北京中华，一九六二年）由此可见其制颇为完善。

- ⑩有杜正胜译本，幼狮月刊学术丛书A，台幼狮文化，一九七四年。
- ⑪见《皇清经解续篇》卷千百十八至千百六十六、卷千百七十至卷千百七十一。
- ⑫参考洪楼《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简介》，见《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页八〇——二；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见《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七期，页三九——四八；《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见《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页四五——五七；金镛《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见《光明日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
- ⑬参考晓蕪《长沙马王堆汉墓概述》 见《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页四〇——四；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见《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页一——七。
- ⑭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三册《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释文，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 ⑮参考夏平《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引〈诗〉所用抄本时代考》，见《急就二集》，页二〇五——一五。

